区域文化差异对远迁水库移民返迁的影响*

王茂福　黄　勤　　方先

摘要　本文回顾了我国水库移民的主要类型及移民返迁的基本特点，指出有部分远迁水库移民客观面临区域文化差异，认为区域文化差异是造成部分远迁移民返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　王茂福，1963 年生，社会学硕士，1995 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现为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湖北武汉　430074）

黄　勤，女，1966 年生，长沙铁道学院硕士生。（湖南长沙　410000）

方先，1958 年生，湖北丹江口市移民局办公室主任、经济师。（湖北丹江口　441900）

随着黄河小浪底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大规模移民的到来，我国水库移民史又将迎来一次大的移民高潮。前车为鉴，受益后世。认真研究我国过去水库移民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水库移民返迁问题，对搞好高潮阶段的移民有效安置具有深远意义。

一、我国水库移民及返迁的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共修建了 86000 多座水库工程，移民达 1000 万余人。这些水库移民有多种类型。1. 从行政区划角度看，有远迁移民、近迁移民、就近后靠移民。远迁移民指移民离开本县，在本省其他县或外省进行安置。近迁移民指移民所在村民组没有就近后靠的条件，而搬迁到本村、本乡、本县的其他村民组安置。这种移民的条件是移民所在县、乡不被全部淹没，倘有部分村组处于淹没线以外的安全地带，并有一定的环境容量来吸纳本县移民。就近后靠移民指在水库淹没线以上合适地带就地安置的移民，这种移民距离原居住地不远，仍在库区周围，传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基本没有改变。一般没打乱原有的村民组建制。2. 从移民搬迁后原有建制的变动看，有成建制集中安置的移民、大分散小集中安置的移民、分户插队安置的移民。成建制集中安置的移民即保持移民原有的乡或村的建制不变，集中安置在可成片开发的安置区。大分散小集中安置的移民即按村民组（小队）的建制，安插到安置区的自然村中，并且安置区的若干自然村都接纳了迁出区的一个村民组。分户插队安置的移民，又叫分散安置的移民，即移民原有建制全部打乱，按 1～2 户的规模分别插入到安置区的若干村民组中。3. 从移民安置点的落实来看，有投亲靠友的移民和依靠各级政府落实安置的移民。前一种移民在自愿基础上可以自由选择安置点。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人际关系如投亲、靠友、随军、随干等去实现迁移。后一种移民则完全依靠地方各级政府确定移民安置点，具有更强的非自愿性。

在我国庞大的水库移民人口中，曾有许多人返迁。水库移民返迁是指水库移民从安置区又返回到库区周围生活。从返库后生活时间的长短看，水库移民返迁包括暂时性返迁和永久性返迁两种。保守测算，在全国 1000 万水库移民中大约返迁 51.41 万人次，平均每百个移民中至少有 5.1 人次返迁；在水利部直属水库移民 300 万人中，平均每百个移民至少返迁 17.13 人次。在水利部所属的众多大型水库中，山东东平湖水库的移民返迁总人次及相对返迁人次两项标志均占第一位，以下依次是三门峡水库、丹江口水库、新安江水库。详见下表。

我国水库移民返迁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基本特点

* 本文是湖北省教委 1997 年重点科研项目“水库移民返迁及控制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湖北省教委的资助。

主要水库移民返迁情况表

水库名称	实际迁移人数（万人）（1）	返迁人次（万人次）（2）	返迁率（人次/人）（3）
东平湖水库	27.83	23.61	84.84%
三门峡水库	41	15	36.58%
丹江口水库	41.2	10.8	26.21%
新安江水库	30.9	2	6.47%
总计	140.93	51.41	36.47%

资料来源：1. 东平湖水库的数据（1），（2）见水利部移民办公室主编. 水库移民领导干部培训班教材汇编. 1990，381～382；2. 三门峡水库和新安江水库的数据（1）见刘根生等主编. 水库移民. 华艺出版社，1991，28；3. 三门峡水库的数据（2）见徐山林主编. 重辟一片新天地.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13；4. 新安江水库的数据（2）见社会学研究. 1994（3）：10，可另见中科院编. 长江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1987；5. 丹江口水库的数据（1）、（2）系作者根据《丹江口水库开发性移民工程系统研究》一书中的"大事记"整理而来。

是：返迁者多为远迁移民。而且进一步考察远迁移民的返迁，可发现如下两点：1. 有两种形式：集体返迁和零星户返迁。集体返迁指许多移民户有组织地一起返迁。零星户返迁指个别移民家庭自发地返迁。1984～1987年间，中央政府先后针对许多水库实施解决移民遗留问题方案，这导致远迁水库移民返迁的这两种形式在此前后呈现出不同状态。此前，集体返迁时有发生，零星户返迁也很普遍；此后，集体返迁逐渐少见甚至没有，但零星户返迁仍可见。目前，零星户返迁主要是移民返回到库区周围的小城镇，返迁者原来在安置区多从事农业生产，返迁后则多从事二、三产业活动，如开餐馆、做缝纫、修理鞋帽、回收废旧物品、贩卖蔬菜食品、人力运输、建筑劳务等。2. 远迁集中安置的移民与远迁分散安置的移民相比出现返迁的时间较晚。远迁集中安置的移民包括成建制集中安置的移民和大分散小集中安置的移民。一份关于河南淅川县移居荆门市的移民报告指出：远迁该市集体安置的移民"在迁居后的三年多时间内，尽管生产条件很差，生活水平很低，但移民极少有返回库区的"。相反，远迁该市分散安置的移民在迁居后的二年内就有大批返迁、外迁。[1]

我国水库移民返迁的上述特点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区域文化差异是导致远迁移民返迁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客观面临区域文化差异

从区域文化角度看，水库移民就是因兴建水库工程使迁出区人口从一个区域文化向另一个区域文化的迁移，或者在一个区域文化中从一个区位向另一个区位的迁移。区域文化"是在某特定区域出现的文化"，"是文化的空间分类，是类型文化在空间地域中的凝聚和固定"。[2] 中国仅在汉族居住区就有众多区域文化，如关中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荆湘文化、吴越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等。[3] 按是否跨区域文化迁移，可以把水库移民分为跨区域文化的水库移民和区域文化内的水库移民。

从区域文化角度划分出的水库移民类型与从行政区划角度划分出的水库移民类型有一定的联系。跨区域文化的水库移民只是远迁移民中的一部分，而区域文化内的水库移民包括近迁移民、就近后靠移民和一部分远迁移民。因此，远迁水库移民可分为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和区域文化内的远迁水库移民。我国存在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和区域文化内的远迁水库移民。山东东平湖水库向东北三省的移民、三门峡水库陕西库区向宁夏自治区贺兰等八个县的移民、丹江口水库河南省淅川县库区向青海省循化撒拉等三县的移民及向汉水下游的移民，这些都是跨区域文化的远迁移民。结合具体的区域文化看，东平湖水库向东北三省的移民也就是移民从齐鲁文化向关东文化的迁移，丹江口水库移民的跨区域文化迁移就是移民从中原文化向青海少数民族文化及荆楚文化的迁移，三门峡水库陕西库区移民的跨区域文化迁移就是他们从关中文化向宁夏少数民族文化的迁移。下述的我国水库远迁移民则是区域文化内的远迁移民：三门峡水库陕西库区向本省渭北旱塬诸县的移民、新安江水库浙江淳安县（含原遂安县）库区向本省邻县的移民、丹江口水库河南淅川库区向本省邓县及湖北省襄阳县的移民。大致说来，这些区域文化内的远迁移民分别就是移民在关中文化内的迁移、在吴越文化内的迁移、在中原文化内的迁移。

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客观上面临区域文化差异，即面临着迁出区或库区所在区域文化与安置区所在区域文化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面临的区域文化差异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差异是两个区域文化的表象差异。跨区域文化迁移的水库移民一般会感受到两个区域文化在物质文化现

象方面有所不同，在非物质文化现象方面如民间艺术、风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甚至宗教观念等都有一定差异。第二个层面的差异是两个区域文化的内在差异。跨区域文化迁移的远迁水库移民在安置区生活一段时间后可能会体悟到迁移前后的两个区域文化在某些文化特质和文化丛的使用价值、功能方面存在差别。跨区域文化迁移的远迁水库移民一般能比较容易地感知区域文化间的表象差异，而对区域文化间的内在差异的感知则有一个较长、较复杂的过程，而且他们往往先认识到区域文化间的表象差异，后认识到区域文化间的内在差异。

从区域文化的构成内容看，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所面临的区域文化差异主要包含以下方面：耕作方式的差异、饮食习惯的差异、方言差异、婚丧风俗差异、民间文艺的差异等。这里试以丹江口水库河南淅川库区移民移居汉江下游后所面临的区域文化差异作典型分析。淅川远迁移民主要安置在湖北的荆门市、钟祥市。迁出区和安置区的直线距离均超过200公里。历史上形成了以汉江沿岸的襄阳一线为界，南北分属荆楚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的格局。河南淅川处在中原文化中，而淅川远迁移民的安置区处在荆楚文化之中。远迁移民安居后会认识到安置区的老居民的文化与迁出区故有的文化有较大差别。第一，耕作方式差异。移民的迁出区世代以种植小麦、玉米和红薯等为主，旱地作业。安置区则是水田作业为主，栽秧季节整天赤脚，蚊虫、蚂蟥叮咬，栽秧、割谷整天弯腰，一根枞担或扁担搬运收获物。第二，饮食习惯差异。淅川移民在迁出区世代以小麦、杂粮为主食，不习惯一日2～3餐大米干饭。安置区则以大米为食，夏季农忙时习惯于中午吃泡饭，早晚都可能吃干米饭。米酒、泡菜是安置区老居民的佳品，而馒头、饺子、面饼则是迁出区居民的美食。迁出区一般以大葱为佐料，极少见香葱，而安置区多以香葱为调料，很少食用大葱。第三，方言差异。处在楚方言区中的荆门人和钟祥人与处在中原方言区的淅川人存在较大的方言差别。迁出区流行的某些口头语汇在安置区可能没有，而某些在安置区老居民中流行的口头语汇则在迁出区没有。特别是在迁出区和安置区两地之间还存在许多语音相同但语义相去甚远的语汇。以人际称谓语汇为例，“爷爷”一词的淅川普遍用来称呼爸爸的父亲，而在荆门和钟祥则用来称呼姑妈（在某些地方，姑妈也被称呼为“yaya”或“llangllang”）。“爹爹”一词在淅川用来称呼爸爸，而在荆门和钟祥用来称呼爸爸的父亲。第四，某些日常行为方式的差异。在荆门和钟祥安置区，老居民中男性像成年女性一样经常清洗会阴。而在迁出区无论是成年男性还是女性，都少有这种日常例行性行为。第五，节日习俗和婚丧习俗的差异。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在迁出区和安置区的老居民中有不同过法。淅川居民以农历腊月30日的晚饭即一年的最后一顿为年饭，而且必定要吃饺子。荆门和钟祥人则以早餐或午餐为年饭，而且年饭必定是家庭最丰盛的酒席，不注重饺子。婚俗亦有差异。结婚时男到女方家做上门女婿，在荆门和钟祥不足为怪、视之当然，而在淅川则无此婚俗。至于婚姻中的彩礼、媒人的设立、婚礼仪式、婚宴等在迁出区居民和安置区中老居民之间都有差别。恕不逐项具体比较。上述比较分析表明，远迁的淅川移民面临着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别。由此进一步可推论认为：远迁水库移民如果是跨区域文化迁移的居民，客观上必然会面临区域文化差异。

有必要指出，区域文化内的远迁水库移民，则没有面临区域文化差异。至于近迁水库移民、就近后靠水库移民一般是区域文化内的水库移民，他们都不会面临区域文化差异。

三、区域文化差异对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返迁的影响

在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安置区，受区域文化差异的作用，部分老居民和部分移民（或称新居民）会产生两种主体反应。

其一，产生文化中心主义，即在安置区的老居民和移民中可能有人以故有的标准去评价对方的区域文化，认为自己区域的伦理、婚姻形式、服装款式、耕作方式、饮食方式、审美情趣、行为规范、信仰、价值观念等等都优于对方，常常怀疑、敌视对方的区域文化。文化中心主义在远迁移民安置区有多种表现。如，移民中“月是故乡明”的文化心理。凡是故乡的文化，移民便想亲近，更愿意将其传承下去。再如，安置区的新老居民相互奚落、讥讽。在移居汉江下游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区，移民和老居民就因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差别而讥笑对方。有移民称老居民为“水耗子”，而某些老居民则称呼移民为“旱鸭子”；原因是老居民中有人有夏季喜欢游泳的行为，而移民中很少有人会游泳。在安置区里，移民会讥笑老居民中的男性有像女性常洗会阴的行为习惯，

而老居民对移民中的成年男女没有这种行为习惯感到不可理喻。

美国学者伊恩·罗伯逊指出:“文化中心主义使人们相信和信任自己的传统,阻止外来文化的渗透,从而保证了群体的团结和统一。”但同时,它又“引起群体间的敌对和冲突”。[4] 移民安置区中的文化中心主义具有正功能,它强化了移民群体和老居民群体各自内部的团结、合作。同时它又有负功能,它可能在移民群体和老居民群体之间诱发敌对和冲突,从而引起移民返迁。1968 年,丹江口水库淅川移居荆门的移民与老居民发生武斗,经驻军干预事态被平息。事后,移民害怕报复,有一万余人返迁。事件中显见出移民安置区中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负面功能在作祟。文化中心主义同样也是河北潘家口水库“蓝旗地村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蓝旗地村现为水淹之地,原居住着满族八旗之一的蓝旗人。该村居民移居他乡后曾多次闹返迁,主要原因是村民始终眷恋着“从祖宗那里延袭下来的部落整体文化”。[5]

其二,区域文化差异对安置区中的新老居民提出了文化适应要求,部分移民的文化适应水平较低。水库移民工作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最终使移民摘帽(即不再认为迁移者是移民)。为此,在存在区域文化差异的远迁移民安置区,实现新老居民文化上的融合与搞好政治安抚及经济保障同样是关键之举。新老居民在安置区的社会交往中相互适应对方固有的区域文化是他们在文化上融合的途径。这种文化适应就是新老居民在安置区中认同、接纳对方原有文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新老居民的再社会化。这一过程对于新老居民能否实现文化上的融合、能否在安置区中长期和谐共存至关重要。特别是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能否顺利适应安置区固有区域文化,将直接影响他们能否长久安居下去。然而,实际上在我国跨区域文化的远迁水库移民安置区,新老居民特别是移民对对方固有文化的适应具有鲜明的个体性水平差异。对于安置区固有区域文化中某一文化特质,有的移民适应较快,有的则较慢;有的移民可能在心理上认同、在行为上接受,有的移民则可能不但行为上不接受、在心理上也不认同。在相同时段里,有的移民能适应的文化特质可能很多,而有的移民则可能很少。不可否认,在跨区域文化的远迁移民中会有一部分人对安置区中老居民固有文化的适应处在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有移民不愿改变耕作方式、饮食习惯,讥笑安置区老居民的婚俗、年节习俗、方言等等。据说,淅川移民远迁江汉平原后,许多人在最初几年背着大米远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去兑换面粉,他们更愿意吃面食,不乐意吃大米。某些移民具有较低的文化适应水平表明他们一时难以完全融入安置区新的文化环境中。这无助于他们稳定生活、安心生产。

上述只对我国水库移民返迁者多为远迁移民这个基本特点作出了解释,以下试图对远迁集中安置的移民较远迁分散安置的移民出现返迁的时间较晚这一细微特点作出分析。

跨区域文化的远迁移民集中安置区类似于国外的“唐人街”,自成一方文化小区。移民带着迁出区特有的耕作方式、生活习惯、习俗、方言等,集体被安置在安置区全新的区域文化环境中。从长远看,他们最终将融于安置区中新生态的文化之中。但是,在搬迁伊始的一段时间里,跨区域文化的远迁集中安置水库移民可以尽可能地在移民群体内部互动。因此,新老居民中文化中心主义大暴露需要一段时间,相互间的文化适应可缓慢发生,文化适应中的阵痛可以相对被推迟。而跨区域文化的远迁分散安置移民则不一样。那些分户插队的移民被嵌入陌生的村民小组后举目无亲,孤立无援,面对习俗的差异、语言的障碍、价值观念的反差等等,他们不得不立马与众多老居民发生全面交往,导致新老居民中某些人很快流露出文化中心主义。这些分散安置的远迁移民很快走上了痛苦的文化适应旅程。文化冲突随之而来。

四、简要结论

中国水库移民返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返迁者多为远迁移民。很重要的原因是远迁水库移民有一部分是跨区域文化迁移的移民,这部分远迁移民在安置区面临区域文化差异。区域文化差异是安置区中新老居民产生文化中心主义的客观前提,也给新老居民提出了适应对方固有区域文化的要求。新老居民中具有一定负功能的文化中心主义和某些移民较低的文化适应水平,使安置区固有区域文化失去了对全体远迁移民的有效羁绊,部分远迁移民返迁便可能发生。

跨区域文化迁移的那部分远迁移民有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类型。安置类型的变化使得安置区新老居民中的文化中心主义和移民适应新文化的阵痛二者产生的时间有所不同,这是跨区域文化迁移

二战以 后从香港向澳大利亚人口 迁移的历史变动及原因分析

杨 光

摘要 香港回归前, 港人沿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传统, 大量向海外移民。这一趋势在 90 年代初期达到高潮。香港移民的流向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这些国家中尤以澳大利亚最为突出。香港居民迁向澳大利亚, 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移民的类型、数量和规模深受香港和澳洲两地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作者 杨光, 199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现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工作。(北京 100044)

香港作为一个有向海外移民传统的地区, 其海外移民的流向主要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几个国家。成规模的香港居民向澳大利亚的迁移始自二战以后。其变动情况如下:

从图 1 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移民中香港出生人口自 1947 年以来在逐步增加。特别是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 它的数量成倍增长。到 1996 年其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但规模仍然很大。

以下将从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角度分析这一人口变动的原因。

一、对迁出地——香港的人口迁出的分析

确切地说, 从香港到澳大利亚的大规模迁移是 7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香港人离开香港,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是导致香港人离港的主要原因。

据澳大利亚 Wollonggong 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Multicultural Studies)的 Regelia Pe-Pua 等教授对 60 户空中飞人家庭所做的调查中, 在离港第一位的原因选择上, 有 83%的家庭选择政治上的不稳定

的部分远迁移民有的早返迁, 有的晚返迁的原因。

最后有必要说明, 区域文化差异只是部分远迁移民返迁的一个原因, 远迁水库移民的返迁无疑是诸多原因综合造成的。移民对安置区地理环境的适应、安置区的环境容量、库区开发后环境容量的增加、移民搬迁前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反差、移民社会关系的重组、安置区公共权力的非公正行使、区域文化差异等等都可能对部分远迁移民返迁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丹江口水库开发性移民工程系统研究"课题组. 丹江口水库开发性移民工程系统研究(上册). 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印. 未公开出版, 1993. 543~545

2 李德勤. 中国区域文化. 太原: 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 1995. 2

3 李德勤. 中国区域文化. 太原: 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 1995. 10
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30

4 伊恩. 罗伯逊著, 黄香馥译. 社会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87

5 王立新. 要塞上的海, 长城, 1991(3): 40~42